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

——祝贺草婴先生九十华诞

3月24日，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迎来自己的90岁生日。草婴以翻译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全集闻名，现代出版社新近出版彩色插图本《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可谓送给草婴先生最好的生日礼物。日前，草婴先生将这套珍贵的彩图本“全集”赠送给巴金先生故居，以感谢巴老对其译事的长期鼓励。我们特意邀请了上海文艺版《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翻译家曹元勇先生为本报撰文，回忆草婴先生其人其事。

新京报漫画/赵斌

【草婴简介】

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年3月生，浙江镇海人。1941年开始翻译俄苏文学，20世纪50年代翻译尼古拉耶娃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肖洛霍夫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顿河故事》等。60年代后翻译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托尔斯泰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全部小说。2003年著有《我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六十年》。1987年获苏联“高尔基文学奖”，2006年获俄罗斯“高尔基文学奖章”，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1年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

《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草婴译
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2年现代出版社新版。

草婴其名由来

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去世后长眠的墓地是一处林中空地，他的坟墓也只是一个长满绿草的长方形小土丘；墓前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甚至连墓主的名字都没有。托尔斯泰辞世六十多年后，也许是安睡在这块林中空地下面的不朽灵魂发出了召唤，在中国上海，一个给自己取笔名“草婴”的翻译家在年过半百、历经坎坷后，矢志把余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在从俄语原文翻译这位大文豪的小说作品上。从1977年到1997年，经过整整二十年焚膏继晷、全力以赴的工作，草婴先生以一个人的努力，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包括三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以及六十多部中短篇小说，从俄语直接翻译、校订出来，实现了他这项令人敬慕的宏愿。

草婴先生的原名是盛峻峰，生于1923年，今年迎来九十华诞。在谈到为什么采用“草婴”作笔名时，他曾对友人说：“草，极其渺小又极其平凡，不仅野火烧不尽，就是脚踏也踏不死的。”“草，是最普通的植物，遍地皆是，我想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子民。”在现实生活中，草婴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瘦小、文雅、和蔼的文人；如果他走在大街上的人群里，他一定普通得如同随处可见的草一样。但就是这位像草一样普通的子民，为中文读者建造了一座通向文豪托尔斯泰的壮丽虹桥。

好的翻译让你无法分出翻译家与原作者

像众多不懂俄语的中国读者一样，我也是通过译本来感受托尔斯泰作品的伟大和丰富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有幸读到了草婴先生翻译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通过草婴先生朴实无华、但又十分亲切的译文，聂赫留朵夫、安娜等小说人物及其活动细节刻入了我的记忆。但我真正系统阅读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则是在2004年。当时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出版，趁着策划编辑草婴先生翻译的十二卷“绘图典藏版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机会，重读了以前读过的几部长篇、中短篇和未曾读过的其他小说。这次阅读，一方面使我对托尔斯泰高超的叙事艺术和他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有了更为深入的感受，另一方面也使我对草婴先生的翻译成就产生了由衷的感佩。这种感佩就像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在《草婴先生》一文中所表达的：“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确实，在阅读的过程中，草婴先生的译文常常会使你忘记是在阅读一本翻译作品，忘记了译者的存在，完全沉浸在作品里，直接面对着托尔斯泰的世界。草婴先生自己说过：“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应该是译文读者读后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后的感受。”他的译文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逼近了这种境界。

作为一代翻译大家，草婴先生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完全不像现在的很多文学译者随便抓到一本书就译、译起来的速度又快得惊人。草婴先生曾以《战争与和平》为例说：“托翁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读懂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自己的头脑里清晰了，译时才能得心应手。”草婴翻译这部文学巨著前后整整花了六年光阴，其中所下的工夫和他的严谨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为宣扬“人道主义”而翻译

不过，草婴先生让人敬服的不只是他对待文学翻译的严谨、毅力和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更为让人敬重的是他所抱持的人文情怀和追求。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专注、持之以恒二十载投入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其强大的内在动力就是他对人道主义的执着追求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良知。在“文革”十年浩劫中，他因为翻译过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作品，被划为重点批判对象，受到隔离审查，乃至被赶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那些年，他不仅在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折磨，肉体上也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在农田劳动中胃出血，一次是干重体力活时胸骨椎压缩性骨折。也正是这种炼狱般的磨难，让他对社会、对人、对文学有了深刻的思考。他曾对作家冯骥才先生说过：“在十年动乱的煎熬中，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在另一处和友人的谈话中，他说：“在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命运，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也是人类无数次浩劫的原因。要结束这样的悲剧，必须宣扬人道主义。”可以说，在“文革”结束后，他暗下决心，用余生之年完整系统地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其精神根源和动力就在于此。因为他觉得：“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而且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这件事以前从未有人做过。

今天，我们可以说正处在一个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的繁荣时期，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数可谓众多，有些翻译家出版的翻译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翻译水平也可谓优秀，但与草婴先生这样的翻译大家相比，也许最重要的差距就是翻译背后对人道主义人文情怀的追求吧。更何况，“人道主义”这些似乎“陈旧”、“过时”的语词，在我们的现实中并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呢。

特约撰稿 曹元勇（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翻译家）

责编 吴永熹　美编 倪萍　责校 赵琳